

评析本话三礼



胡禮



禮記

儀禮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K224.06
1

评析本三礼 白 话

主编 王 宁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京)新登字 148 号

评析本白话三礼

王 宁 主 编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出版

(朝阳区东郊定福庄 1 号)

四二二九工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20.75 字数:513 千

1992 年 12 月 第 1 版 1993 年 2 月 第 1 次印刷

印数:5500 册

ISBN 7-81004-259-9/B·13

定价:10.10 元

序

古书今译的工作，近年来经一些先辈师长的提倡，引起了社会的重视，也有一些专家身体力行，亲自执笔来从事这项工作，出现了一些很有价值的译本，积累了一些宝贵的经验。但是，对这一工作的不同看法仍然是存在的：古书是否有必要今译？能不能今译？仍有一些人持否定的态度。这是因为，从客观上说，历史上的文献典籍中积淀很深的文化内涵，绝不是通过简单的文言和白话的语言转换就可以传达竟尽的。而且，文言和白话虽然都是汉语，但却是词汇系统、语法系统有了很大差距的不同时代的语言，要想完全对等的转换其实办不到，即使是水平再高的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语义上不得已的失落与添出也难以避免。读译文，总不如读原文更好。而从现实的情况说，如今社会上的古书今译的确非常杂乱，选材不问精华糟粕，译者不论对典籍是否进行过钻研，突击应付之作确实有之，有些译本或难点随便跳过，或成段删除原文，或随意编造译文——这种情况使一些学者颇为担心，直怕滥译下去会大量浪费纸张，无谓地消耗读者的精力，甚至贻误青年与热情的读者。

面临上述问题和分歧的存在，我们在接受广播学院出版社关于十三经与诸子的白话全译这一选题约稿时，曾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踌躇。先秦（一部分已是魏晋）时代的经书与子书都是在中国文化史上有过权威影响的典籍，其中大部分典籍历代学者都有讲述，出现了不少集大成的注本，又有大量训诂材料与之相应，翻译的依据不愁没有。但是，这些典籍文化积淀极深，相当一部分涉及典章制度、古代习俗的词语译文难以下笔，校勘、辨伪、训诂等问题还有一些未能定论，译者如无一定的积累，要读的参考文献是相当多的。诸子的问题还不只是文字训诂

问题，涉及古代的政治、经济、哲学、宗教、科技……等专门问题，有些专门问题一部典籍里就涉及多种，领域极为宽泛。而且，熟悉经、子训诂的人都有体会：历代注家在选择注点时，都是从他们那个时代，用专家的眼光来选择的，而他们认为不需注解的，有些对现代人仍很难理解。其实，有些注家对疑难问题也有“绕着走”的时候，何况，也有的典籍注解很少或没有注解，一部分难点可资借鉴之先期成果难以找到，一些典故的典源，一时也很难查到，不敢妄加译文。既要全译，上述问题都无法躲开。有一部分典籍和一部分典籍的某些章节是首次翻译，正反面的启发都没有，全靠统观全书、参考同时代、同作者的其他著作来理解。这些困难，曾使我们不敢动手来作这一工作。

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酝酿，我们对十三经与诸子的白话全译工作的意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有人把古书的白话全译工作称为“普及工作”，其实，象十三经和诸子这样的典籍，即使译成白话，也不会被一般人当作普及读物来读的，这种白话译本所能产生的社会效应恐怕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给需要通过经书和子书获得历史的借鉴而又找不到充裕时间通读艰深文言文的研究者作参考，在他们对典籍的原貌和全貌有所了解后，再来精读自己所需的那一部分。这样作，可以避免断章取义和挂一漏万，另一方面，是使具有一定文化水平、对中国古代文献比较有兴趣的读者免去被文言文阻隔的困难，直接接触到经书、子书的全文，更快地提高文化素质。我们不能要求全社会都普及文言，更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大量读文言作品，但了解我们国家与民族的历史、提高几代人的文化素质又势在必行，古书今译或能在某些方面对此起到一定的作用。何况，现在的今译，尤其是全译，不是太多了，而是还很缺乏，这一工作还是很有意义的。至于译文能否周满地反映历史文化原貌、全然消除时代的文化隔阂问题，我想如果双语翻译，比如英语、法语、德语、俄语……汉译可以部分地消除东西方异民族的文化隔阂，同一民族的时代隔阂恐怕不会更有甚者！即使由于种种原因，译文的准确度有不足这处，只要继续努力，是可以得到逐渐的改进的。严肃的翻

译多了，粗制滥造的东西便会自然淘汰；不成熟的翻译如不继续改进，也会被更好的译文代替，在这个过程中出一些昙花一现的译本难以避免，不能认为是浪费纸张。

我们这次约请的译者、评介者和审校者，在上述问题上，认识基本一致，这是译、校、评介的工作能够顺利完成的保证。

这里，我们还需要对以下几个问题加以说明：

(一) 本书以《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和《诸子集成》(中华书局1954年用世界书局原版重印本)为主要底本，说法有分歧的尽量选择一种公认正确的结论。实在难以确定的，一般以上述两部书及其训诂为准。十三经句读有疑难的，以黄侃手批《白文十三经》句读为准。不合以上三书之处，一般都加注说明，只有赵守正先生译的《管子》因所取底本为《四部丛刊》本，同时参照其他注本作过勘正，因此，原文与《诸子集成》不合之处较多，译文没有一一加注。

(二) 本书绝大部分是新译，其中少部分在征得作者或代理人的同意后，选用了一些现成的译文(这部分在译者名字后用了“原译”字样)。这部分译文的选入大约基于以下三种考虑：一是选了一些前辈学者的早年译文，以便吸取当时的翻译经验，例如高亨先生所译的《商君书》和《老子》，都是从早期译本中辑录的，杨伯峻先生所译的《论语》、《孟子》，我们是从他著的《论语译注》、《孟子译注》的第一次修订本上辑录的。二是选了一两部有影响的首次全译本，例如沈玉成先生译的《左传》、赵守正先生译的《管子》。三是在众多同一文献的译本中，选了几部有经验的作者的较新译作，例如黄寿祺、张善文先生译的《易经》、王世舜先生译的《庄子》和杨柳桥先生译的《荀子》等。这些译文在辑录入本书时，都经过一番统一体例的整理工作，并对译文作了不同程度的重新校订。

(三) 为了尽量使译文合乎要求，我们采取了如下措施：

(1) 一律采用直译。从体现原著精神说，意译比直译更有利。但意译容易出现主观随意性，掌握起来有一定困难。我们是第一次对“十三

经”和“诸子”这样重要的典籍进行全译，经验不够丰富，积累还嫌不足，直译更便于忠实原著

(2) 译文不能足意或原文词语内涵较多难以择定译语的，另加必要的注释。本书注释是译文的注释，不是对原文注释的摘取。

(3) 译文一律不跳过词、句、段、章，实在难以翻译的词、文句和典故，采用阙疑的作法，加注存疑，使读者了解，并有利于专家师友指正。

(四) “十三经”与“诸子”中，都有一些典籍是不宜进行今译的。例如《仪礼》和《周礼》中有关典章制度和官职的名称，本身带有特定的含义，不可能有与之对应的现代汉语。又如《尔雅》，本是一部保存故训的“小学”专书，本来就无法进行一般意义上的翻译。但是为了真正作到全面介绍“十三经”与“诸子”，我们也采用了一些办法来处理这些问题。《仪礼》和《周礼》中的一些带有特殊含义的词语，一般采用译文直出原词语而另加注释的方法以示其意。《尔雅》则仅用现代汉语转换训诂体例以明确训释词与被训释词的关系，另对一部分义训的训释词语改用现代汉语加以表述。被训释词一律不译，个别引文适当加注。

(五) 我们这次采用的是只印译文、不印原文的办法。这是因为，我们作为底本的《十三经注疏》和《诸子集成》发行时间都还不长，很多读者手中已经有了，不印原文，对多数读者说来，可以减轻一些购书的负担。在本书出版之后，是否需要在再度进行校订、修改后，另出文白对照的注本，这恐怕要根据今后的情况而定了。

这次的工作，是文字训诂学、文献学、古代文学、哲学史、思想史、经济史、军事史和中国通史各领域作者的合作。为了培养人才和将这项工作长期延续下去，评析者和译者中，都有一批中青年学者，而审校者则多半是在某一方面有专长和有经验的专家。我们自己和我们的作者对典籍的熟悉和理解还有不足之处，但大家严肃认真的态度都是一样的。本书的几位责编，曾为了约一部译稿或请一位作者冒着酷暑跑四五

趟郊区；有些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写的札记比译文要多出几倍；许多审校的先生严格要求译者，审校稿被退回几次的不是一部两部，而译者从未不耐烦过；有些审校者与译者在一起切磋难点的译法，常常直到深夜……

尽管如此，限于我们的功底、水平，加之经验不足，本书的问题仍会很多，今后的校订修改任务还很大，我们诚恳地希望听到专家、师友和读者的批评。

王 宁

一九九二、三

目 录

《周礼》

评析·····	(3)
天官冢宰第一·····	(14)
地官司徒第二·····	(39)
春官宗伯第三·····	(69)
夏官司马第四·····	(97)
秋官司寇第五·····	(119)
冬官考工记第六·····	(145)

《仪礼》

评 析·····	(167)
士冠礼第一·····	(172)
士昏礼第二·····	(178)
士相见礼第三·····	(187)
乡饮酒礼第四·····	(190)
乡射礼第五·····	(197)
燕礼第六·····	(216)
大射第七·····	(224)
聘礼第八·····	(242)
公食大夫礼第九·····	(258)
觐礼第十·····	(264)

丧服第十一.....	(266)
士丧礼第十二.....	(279)
既夕礼第十三.....	(292)
士虞礼第十车.....	(302)
特牲馈食礼第十五.....	(310)
少牢馈食礼第十六.....	(322)
有司第十七.....	(331)

《礼记》

评 析.....	(349)
曲礼上第一.....	(355)
曲礼下第二.....	(367)
檀弓上第三.....	(373)
檀弓下第四.....	(389)
王制第五.....	(405)
月令第六.....	(418)
曾子问第七.....	(433)
文王世子第八.....	(444)
礼运第九.....	(451)
礼器第十.....	(459)
郊特牲第十一.....	(467)
内则第十二.....	(476)
玉藻第十三.....	(488)
明堂位第十四.....	(498)
丧服小记第十五.....	(502)
大传第十六.....	(507)

少仪第十七.....	(510)
学记第十八.....	(516)
乐记第十九.....	(520)
杂记上第二十.....	(533)
杂记下第二十一.....	(539)
丧大记第二十二.....	(548)
祭法第二十三.....	(558)
祭义第二十四.....	(561)
祭统第二十五.....	(570)
经解第二十六.....	(577)
哀公问第二十七.....	(579)
仲尼燕居第二十八.....	(582)
孔子闲居第二十九.....	(584)
坊记第三十.....	(586)
中庸第三十一.....	(592)
表記第三十二.....	(602)
缁衣第三十三.....	(610)
奔丧第三十四.....	(615)
问丧第三十五.....	(618)
服问第三十六.....	(620)
间传第三十七.....	(621)
三年问第三十八.....	(623)
深衣第三十九.....	(625)
投壶第四十.....	(626)
儒行第四十一.....	(628)
大学第四十二.....	(631)

冠义第四十三.....	(636)
昏义第四十四.....	(637)
乡饮酒义第四十五.....	(639)
射义第四十六.....	(642)
燕义第四十七.....	(645)
聘义第四十八.....	(646)
丧服四制第四十九.....	(648)

周 礼

评 析

《周礼》是一部专谈古代政治制度的书，是儒家的重要典籍之一。《汉书·艺文志》谈到“《周官经》六篇”，班固自注曰：“王莽时，刘歆置博士。”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则云：“王莽时，刘歆为国师，始建立《周官经》以为《周礼》。”这些话说明了以下两个问题：一、《周礼》原本称为《周官》，改称《周礼》，始于刘歆；二、《周礼》立为官学，成为经典，始于王莽时。《周礼》与《仪礼》、《礼记》并列，并合称为“三礼”，则是在东汉末年郑玄注“三礼”之后。

—

《周礼》仅有古文，没有今文。贾公彦《周礼疏序》云：“《周官》，孝武之时始出，秘而不传。《周礼》后出者，以其始皇独恶之故也。”《史记·封禅书》载，武帝与公卿诸生议封禅，“群儒采封禅《尚书》、《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据此，认为《周礼》出于武帝时似乎可信，但以为秦始皇致使《周礼》晚出则言之无据。《周礼》是谁首先发现的呢？《汉书》、《隋书》、《经典释文》均认为是河间献王所得，而《后汉书·儒林传》却认为孔安国所献。《隋书》、《经典释文》认为河间献王得《周礼》，独阙《冬官》，遂取《考工记》补之；贾公彦本马融说，认为是刘向校书时，发现亡《冬官》，以《考工记》补之。诸说纷纭，有一点可以肯定，《周礼》系西汉时期的“出土文物”，发现时《冬官》已亡佚，后人以《考工记》补之足数。

关于《周礼》的成书，历来也是歧说纷出。归纳起来，大致有三种说法：一、认为《周礼》是伪书，两汉今文学家多取此说，宋以降证伪之作不断出现，康有为甚至认为是刘歆为佐助王莽之业而伪造的（见

《新学的经考》);二、认为《周礼》是周公姬旦之作,朱嘉称之为“盛水不漏,非周公不能作”;三、认为《周礼》系战国时人所作,东汉人何休主此说,清儒毛奇龄、皮锡瑞均信何休之说。当代有的学者否认上述三说,认为《周礼》“成书最晚不在东周惠王后”。例如朱谦之在《周礼的主要思想》(见于《光明日报》1961年11月12日第2版)中说:“此书中所用古体文字,不见于其他古籍,而独与甲骨文金文相同,又其所载官制与《诗经·大雅、小雅》相合,可见非在西周文化发达的时代不能作。”洪诚在《读〈周礼正义〉》(见《孙诒让研究》)中也说:“从语法看,文献中,凡春秋以前之文,十数与零数之间,皆用‘有’字连之,战国中期之即不用。《尚书》、《春秋经》、《论语》、《仪礼》经文、《易·系辞传》皆必用。《穆天子传》以用为常。《王制》、《庄子》不定。《左传》、《国语》以不用为常。《山海经》中之《五藏山经》不用。《孟子》除论述与《尚书》有关之事而外,亦不用。《周礼》之经记全部用,此种语法与《尚书》、《春秋经》同,故非战国时人之作。”二说甚为允当。金景芳在《周礼》(见《经书浅说》)中详细考察了《周礼》所言制度与周制的差异,进一步推论“《周礼》一书是东迁以后某氏所作。作者得见西周王室档案,故讲古制极为纤悉具体。但其中也增入作者自己的设想。例如封国之制、畿服之制一类的东西,就是作者自己设想所制定的方案。这个方案,具有时代特点,但西周不能为此方案,即春秋战国时人也不会作此方案。原因是春秋战国时,周室衰微已甚,降为二、三等小国,当时不会幻想它会复兴。而在西周的历史条件下,则不可能产生这样的设想。”他的说法颇为可取。

综合以上各家的论述,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周礼》一书是在周王朝东迁以后,即在东周平王至东周惠王之间(前770年~前676年)产生的,作者极有可能是管理档案材料的官员。书中所反映的周制,当是西周初期尚未改制,也就是沿用殷制时的周制,同时又有不少内容是作者的设想。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儒学的奠基人孔子从未言及《周礼》,而号称亚圣的孟子为北宫琦述说周室爵禄制度的大概情况,为什么与《周

礼》大不相同。

至于《考工记》，本非《周礼·冬官》的原文，而是另外一部书，这一点没有异说。书中云：“秦之无卢也，非无卢也，夫人而能为卢也。”又云：“郑之刀，宋之斤，鲁之削，吴粤之剑，迁乎其地而弗能为良，地气然也。”秦封于周孝王时，郑封于周宣王时，则此书必在西周孝王和西周宣王以后出现。《南齐书》里记文惠太子萧长懋镇雍州时，有盗发楚王家，得竹简书，青丝编，凡十余编，以示王僧虔。王僧虔曰：“是蝌蚪书《考工记》。”据此可知，《考工记》也绝非秦朝以后的人所作。

《周礼》亡佚《冬官》，自然是古代典籍的一大损失。宋儒俞廷椿在《周官复古编》中，以及王与之在《周官补遗》中，均认为冬官乃司空之属，具体内容则分寄其他五官之下。这种说法已经离奇，而邱葵则作《周礼定本》，径直割取其他五官的内容，归于冬官；吴澄作《周礼叙录》，把地官中掌邦土之官列在司空之下，作为冬官的内容，则尤不可取。

二

《周礼》原有六篇，现存五篇，第六篇是用《考工记》弥补。全书篇目如下：

- 一、天官冢宰——掌邦治，其长官也称大宰；
- 二、地官司徒——掌邦教，其长官也称大司徒；
- 三、春官宗伯——掌邦礼，其长官也称大宗伯；
- 四、夏官司马——掌邦政，其长官也称大司马；
- 五、秋官司寇——掌邦禁，其长官也称大司寇；
- 六、冬官——此篇亡佚。

六官分别称为天、地、春、夏、秋、冬，显然是为了合天地四时之数。《周礼》疏云，天官像天，周天有三百六十度，天官总摄三百六十官，故曰像天。这种说法未免有些牵强。《周礼》一书所立的官职总数